

科学与人文

晚清科学小说刍议

对文学作品及其思想背景与知识视野的考察

张 治

叶永烈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撰写的“科学文艺”条目,以1904年荒江钓叟在《绣像小说》里发表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作为中国科幻小说的最早作品。他所持准的科学幻想小说定义是,“通过小说来描绘奇特的科学幻想,寄寓深刻的主题思想”,并且标举“科学”、“幻想”、“小说”三要素。这其中有可议之处:首先,“寓意深刻”不可作为文体的判断标准;其次,所谓“科学幻想”,叶氏要求它所描绘的“幻想是科学的,而不是胡思乱想”,那么“科学”的标准难以确定——应该尊重当时的认识局限,还是尽以今天的科学价值去估计。此立论大约是受了苏联科学文艺观念的影响,把科幻小说与工具化的科普文学混为一谈。作为一种普及科学、扫荡迷信的手段,自有其社会和时代意义。而对于文学研究,则不能合于文学发展历史自身的内在规律。隐藏在文学历史背后的种种声音,也便难以得到正确的认识。

Science fiction 这个正式的名称是20世纪20年代才确定下来的。^①在晚清人介绍凡尔纳作品的时代,西方还在使用 science stories, scientific fantasias 或 scientific romances 等名称。凡是能认真思考和探索人类生活演进中的效果,题材涉及未来世界、未知空间、未知生命形式,以及文明环境潜在危机的,都可以称之为 science fiction。从内容上看,晚清科学小说大体符合这一范畴。

科学小说在晚清,又不尽等同于西人的 science fiction,它的直接形成显然受到了西方同类小说的影响,然而也不可忽视当时中国知识界逐渐形成的接受与选择的意识。1899年,素隐书屋将《巴黎茶花女遗事》与《华生包探案》合刊,这一事实说明当时的小说类型观念尚未形成,只是由于偶然的机缘促成了各类西方小说的

作者简介 张治,厦门大学中文系讲师。

① 1926年,Hugo Gernsback在美国创办杂志 *Amazing Stories*,鼓吹 *scientifiction*,1929年更名为 *science fiction*。1949年,Charles D. Horning 主编 *Science Fiction* 杂志,这一名称正式确定。

译介。^①然而随着翻译文学局面的扩大以及新式的叙述手法对中国传统小说格局的冲击,产生了感到务必以新标准划定各自范围的小说分类意识。1902年,梁启超在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即已标分“理想派小说”与“写实派小说”,^②而在同年《新民丛报》(14号)上的《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则有更为纷杂的小说类型划分,其中包括了“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割记体小说”、“传奇体小说”等。这其中绝大多数都可以归于“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③的“理想派”下面,这也反映了西方文明激荡下的晚清社会追求新奇的时间、空间体验的一种风气。所谓的“哲理科学小说”,在同时代更多为人们使用的名称是“科学小说”,被说明为“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④,具有“高尚之理想,科学之观察”^⑤,能“默揣世界将来之进步,独抒奇想”^⑥,因此成为当时各家小说杂志争相刊载的一个门类。

从最初“哲理科学小说”到“科学小说”的名称变化反映了彼时小说类型划分的细致化带来的一种困惑:是否应该将对于自然宇宙和社会政治两方面的理想区别开。像柏拉图的《共和国》(*Republic*),在《新小说》的广告里是被放在与凡尔纳的《海底旅行》(*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同一类别里的,而所谓“政治小说”,既名为“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事实全由于幻想”^⑦,却因为立论以中国为主而另外独立。然而日后的具体创作往往表明,科学小说时常涉及科学进步对社会人生的改造(比如《世界末日记》、《空中战争未来记》),而立意于政治理想的作家也不可摆脱对将来中国之科学进步的讲述(比如《新石头记》1908年单行本标为“社会小说”,以及《光绪万年》)。与此同时,对于“理想小说”与“科学小说”的划分,也可以归于这样的一种认识。比如周桂笙曾将二者区别为科学小说“发明真理”,理想小说“寄托遥深”。^⑧因为“赛先生”于五四前夜中国社会的声望日益加重,科学小说要担负起“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⑨的神圣使命,自然应该慎言于“据言以推”的未来理想了。而实际

① 参看陈平原、夏晓虹1997,页10。

② 《新小说》第一号。

③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④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

⑤ 海天独啸子:《〈空中飞艇〉弁言》,1903年明权社版《空中飞艇》。

⑥ 周树人:《〈月界旅行〉辨言》,1903年日本东京进化社版《月界旅行》。

⑦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

⑧ 《〈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1904年《新民丛报》55号。

⑨ 《〈月界旅行〉辨言》。

上被视为“理想小说”的《乌托邦游记》、《电世界》却与“科学小说”的定义与创作规则也都完全符合,足见“忧天”、“忧人”不可简单分为二端。

从晚清时代笼统地以“科学小说”为名目的十几种创作中,我们并没有感觉到彼时的小说理论家们商榷不休的那样一种限度制约。其中大多数关于中国未来社会命运的预言,以及种种新奇科技的想象,在今天看来,似乎都该归于“胡思乱想”的范围里了。不过对于后世人们颇多呼吁的“幻想”或想象力因素^①,在这里看来倒并没有丢失。

综合以上种种考虑,本文所欲讨论的对象即“晚清科学小说”范围必须界定清楚。首先,在此并非尽服从于新小说家们当时所分类的依据;其次,又不能以20世纪中期在东(以苏联为中心)西方(以美国为中心)逐渐明确的标准与规则强加给前人。因此,本文姑且折中晚清的观念和今日的定义,使“晚清科学小说”范围大致不超出此前的学者对于相关论题^②所使用的主要小说文本。须知科学小说亦非单纯的“科学”+“小说”。本文遂意图从不同的角度将晚清科学小说的种种独特的因素加以评析,并把它们和彼时的思想空气、知识趣味以及文化视野联系起来。

一 世外再无桃花源——空间意识的变化

作为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③最大的“科幻含量”,即在于故事中玉太郎与濮玉环夫妇所发明的气球。他们就用这个工具帮助龙孟华环游世界,寻找家人。这可以看作是对凡尔纳《气球上的五星期》^④的一种效仿。1900—1904年间,已经有数种凡尔纳的作品,被冠以不同国籍、不同作者,被重复性地翻译到中国来。似乎应该说,正是这些翻译的科幻作品促成了《月球殖民地小说》的问世,然而,1904年的中国人其实对于气球、飞船这类事物已经很熟悉了。^⑤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出现于中国境内的第一份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

① 如李欧梵曾感叹中国新文学传统即缺乏真正富于幻想的作品,即使如老舍的《猫城记》、沈从文《阿丽丝中国游记》等最富有想象力的作品,也都逃不脱“社会”和“写实”。参看陈思和1997,页327—344。

② 这类相关研究论文包括:陈平原1996;王德威1998;林健群:《晚清科幻小说研究》,硕士论文,未刊稿;吴献雅:《科学幻想与科学启蒙——晚清“科学小说”研究》,硕士论文,未刊稿。

③ 荒江钓叟撰,《绣像小说》1904年21—24期,26—49期,1905年42期,59—62期。

④ 即《空中旅行记》,1903年发表于《江苏》1—2期,未署译者,作者署名为英人萧鲁士。然而只刊出两回,气球并未升空。

⑤ 陈平原1996文中论证了晚清科学小说的想象根据,很大程度上不是得自当时已经翻译了的同类西方科幻小说,对其知识来源与想象趣味发生更多策动力的,倒极有可能是出使官员的海外游记、西人对华报刊、科学普及性读物。对于凡尔纳小说在时人中激发的新奇感不必估计过高。并参看陈与夏晓虹共同编注的《图像晚清》,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页166—173。

面,即有一则“气舟”的“新闻”,^①虚设故事,言一中国人第一次坐气球升空,高至“虽用千里镜巡看,不见一点儿”的地步,降落时候又失控坠下,“落及,伤首,恍惚气窒”。这当然是办此刊物的西洋传教士有意夸耀西方文明,而以此隐喻古老中国将要受到的震慑。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面,各种气球飞船不断见载于中文的海外游记、书刊,从基本原理、实用价值的介绍,到有关乘坐气球的见闻感受,合以图片、诗文,开辟了中国人对于空间体验的想象。清末曾有一则流传颇广的故事,言格致名家华蘅芳在天津武备学堂,遇到德国教习购来一具法越战争所用的行军瞭望“轻气废球”,那洋教习“居奇久之而功不就”,于是华蘅芳“乃督工别制径五尺小球,用强水发轻气,以实其中,演放飞升”,引得观者赞叹,洋教习自惭弗如,退职而去。^②自行研制气球飞行可能比不上蒸汽机、电话机那么直接关切国计民生,但是可能更令晚清的小说家们感到兴奋,刺激他们的想象力。

不过《月球殖民地小说》的作者过分夸张了气球的运用范围,他笔下的气球航行家们后来与月球人巧遇,见到了被月人少女凤鬟带去的龙孟华之子龙必大,而月球人使用的往返太空间的交通方式也是乘坐气球。

关于登月的科幻题材,凡尔纳的小说 *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 在 1903 年已经有中文译本^③。鲁迅本人当时没有接触过凡尔纳所作的后续篇 *Round the Moon*, 根据日文本的原属名《自地球至月球在九十七小时时间》之意,就把《从地球到月球》的书名转化成了《月界旅行》,其中也可以说是反映了译述者对读者阅读期待的一种定位。无独有偶,《月球殖民地小说》也带有文题不合的特点,名为月球殖民地,然而因为没有写完,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故事从头到尾都是在地球上铺陈。主人公几次有登月的想法,但是终究没有成行。十三回里面,日本青年科学家玉太郎梦见天使下降,与己言说气球登月的问题:1. 不能脱离空气;2. 不能离开地面的吸力;3. 不能耐得太空的寒气;4. 不能外太空定向飞行,会被“地球外的旋风”卷走。将它和鲁迅的译本^④相对照,凡尔纳对太空旅行更接近科学事实的估计并没有得到中国作家的注意,大炮俱乐部的绅士们所采用的封闭式太空舱,以及类似火箭形体的外形设想,也

① 丁酉年(1837)四月号。

② 钱基博:《华蘅芳传》,《碑传集补》卷四十三,杨模:《锡金四哲事实汇存》,《洋务运动》第八册“传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9页。按,见近书述此事俱云发生在光绪13年(1887),如沈渭滨主编《近代中国科学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8页)即持此说。在1887年9月7日《申报》所刊载的“演放气球”,记载的却是一起失败的气球试验,其中无华蘅芳名字,参看《图像晚清》,页170—171。

③ 索子译:《月界旅行》,署名美国人培伦,1903年中国教育社,东京进化社。索子即鲁迅先生,按鲁迅是根据日本井上勤译本转译而来,故有“培伦者,名查理士,美国硕儒也”这样有失考证的介绍。

④ 《月界旅行》第九回,见《鲁迅译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页58—61。

使得玉太郎伉俪“中日合璧”的发明颇显得粗制滥造。月球人的气球倒是成功载了龙氏一家三口到月球上读书去,至于其中的奥妙作者不说也无人知晓了。

尽管有以上种种不够“科幻”味的地方,荒江钓叟终究还算是利用了当时国人所见的世界最热门最新奇的科学手段,让中国新派人士们喝一声“开球”,就能实现今日纽约、明朝伦敦的自由往来,可说是表达了当时视野渐已开拓的中国人一种理想寄托。

仅是衣着西洋款式的服装,在欧美列国的大都会里凭空而降,然后操着西洋言语与异邦人士交涉,这在作者看来似乎还不够过瘾,于是又渐渐把环游西方世界的航程带入《山海经》、《十洲记》、《镜花缘》式的海外奇景里,因为受了近代文明的洗礼,所以虚妄荒诞中又有弦外之音。作者描写“鱼鳞国”、“尚仁岛”、“司常煞儿岛”等等,采用的就是寓言手法,其中“鱼鳞国”女子缠手,以兰花指对应金莲足,与《镜花缘》写林之洋在女儿国的遭际相映成趣,有反讽国朝陋俗之意。“司常煞儿岛”上,因为千年之前,酋长嗜食民之血肉,着民人皮革,遂造成国人纷纷筑屋地下,形成习惯,至今不改。阅读此段,颇令人联想到韦尔斯(Herbert G. Wells)的《时间机器》^①,又好像像《庄子·庚桑楚》^②以至鲁迅《狂人日记》所一贯具有的警世之冷峻。比如玉太郎们身穿“五彩电光衣”威吓“蝙蝠岛”土番的一节,有点类似《气球上的五星期》,不过,以声光化电的技术手段,炫威于未开化种族的喜好,似乎应该是大多早期殖民者利用当地蛮人的迷信使自我神秘化、神圣化的一种共同经验。而四周有雪山、火山环绕的“勒儿来复岛”则已然是中国古来移民的殖民地了。作者也许想再描述一个世外桃源,然而既有气球一类无远弗届的飞行器,自然不会再有“逝止判殊路,旋驾怅迟迟”的问津失路者。

可以说,《月球殖民地小说》表达了20世纪初中国小说中空间观念的一种改变,从出使欧美游记与西人科普读物里粗略了解到的空中飞行使地理观从二维变为三维,于是产生了一种从高处鸟瞰世界的联想。

就在《小说》的第三十二回,日本青年志士玉太郎闻龙必大讲述月界风物,不由暗想:

世界之大真正是无奇不有。可叹人生在地球上,竟如那蚁旋磨上,蚕缚茧中一样的束缚。……单照这小小月球看起,已文明到这般田地,倘或过了几年,到我们地球上开起殖民的地方,只怕这红、黄、黑、白、棕的五大种,另要遭一番

① 1915年才有《时间机器》的中文译本,名为《八十万年后之世界》,心一译述,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② 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也。

的大劫了。月球尚且这样,若是金、木、水、火、土的五星和那些天王星、海王星到处都有人物,到处的文明种类强似我们千倍万倍,甚至加到无算的倍数,渐渐的又和我们交通,这便怎样?

这种想法,可以在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中找到先声:

使有人在第四重天已上视地,必不能见,则地之微比天不啻如点焉,而我辈乃于一微点中分采域为公侯、为帝王,于是篡夺称大业,窃脱隔邻疆而侵他畴,日夜营求,广辟□地,殖己封境,于是竭心剧神,立功传名,肆彼无限之贪欲,殆哉殆哉! [朱维铮主编 2001, 页 178]

小说还有另外一条暗线,乃是重弹反清复明的旧调。“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比之更高洁者竟可以“乘风归去”了。高处远望世界以至宇宙之阔大者,自然也看到了中国古来天下之中心帝国说法的荒谬,朝代更替、国族战争的前仇旧恨也可付诸一笑。

为了早日登月,玉太郎伉俪继续试验飞行。然而小说终究是在月上故人鸿雁来书的时节中止,如同一只永远无处降落的气球。这么一个悬而未决的收煞在另一篇小说里再次出现:1906年底创刊的《月月小说》上,萧然郁生写的一篇只有四回就不了了之的《乌托邦游记》^①,书中寻访“乌托邦”的主人公乘坐的飞空艇也许要比气球更进步一些了吧,玉太郎气球上的辐重设施与之比较是小巫见大巫了。艇上不仅有博物房、图书馆,还有一所制造厂,“搭客欲学习制造者,约五点钟即自制造一种物件”。艇上有极好的望远镜,能望见十万里之外、甚或地平线以下的地方,并能即时拍照。而在飞艇图书馆里,更是堆满世界各地的小说,“地球内及地球外无论何处所有新出的小说,本书室于该小说出版后二点钟,即从空中电递器内递到”。自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付梓以来,新式小说如同科学技术一般都成了万众瞩目的新学。对于世间诸多形色的“趋新之士”来说,这样一架飞空艇本身就已经无疑是最为理想的“乌托邦”了,又何必再在乎它驶向何处。再者,在此飞艇之上已经可以广闻博识、见微知著,也不须着急于另求异邦了。

以上两部晚清科学小说,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小说家一种相似的感受,一方面迫切希望展示未知世界,另一方面,又怕到达未知域后将面临词穷意尽的地步。《月球殖民地小说》的几个人物不断梦见至于月界,玉太郎的梦里,月宫有“地球栖流公所”,内殿供应三大圣人,中为如来,东为孔子,西为华盛顿。原来道不行之日,东海西海的仁圣贤哲都已汇聚于此。大同理想虽然高尚,但是与现实国情实在相差太

^①《月月小说》,1906年1—2期。

远,所以到底作者没有写出真的登月建立新殖民地后的生活。^①

1905年夏天,徐念慈收到包天笑由东瀛岩谷小波的日文本转译的德人小说《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续谭》,有感于其中情节的“惊奇诡异”,不禁援笔效作《新法螺先生谭》^②。“法螺”本指一种梭尾螺贝,穿孔吹之,发声甚响。佛教徒用来譬喻佛法传播的广远和教义的雄壮不移,而古时军队亦以之警示进退。而徐念慈能以较短的篇幅,叙述主人公新法螺先生一身为二分别登天入地,令王德威许为科学小说具“雄浑观(sublime)”[王德威 1998,页 58]的佳作。主人公新法螺先生抱着对一切知识的怀疑,信足奔至一海拔 36 万尺的高山之巅,体验到由于诸星球吸力造成的空气巨流,导致身中各种元质分为二体:一曰灵魂,一曰躯壳。随后,新法螺先生在最高处殚精竭虑,“乃将灵魂之身,练成一种不可思议之发光原动力”,以一己之身而普照全球,引起了欧美诸国的大恐慌,然而一小部分中国人却“置刺眼之光明于不顾”,依然在销金帐中淫乐无休。于是激怒新法螺先生,欲掷身为烈火,焚此国土,不料灵肉二体迸裂,灵魂之大半,冲出地球,飞上云霄,历经月球、水星、金星、太阳而又返回地面,躯壳则带着四分之一灵魂坠入地下世界,观看到了自称中国人的老祖先的黄种经营的国民气质实验室。新法螺先生分身为二,在天界旅行的结果不是发现了一个乌托邦文明,而是验证了各星球“凡物都能进化而靡所底止”的共同真理;在地底旅行的结果不是发现了像凡尔纳《地心游记》那样的奇妙世界或失落的文明,而是找到了为“地上中国”伤怀的“地下之祖宗”。^③

此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空间探索精神,当然属于文学中理想主义的一个永恒主题。然而面对科技文明的惘惘威胁,烟涛微茫信难求的海上奇岛,或者是高处不胜寒的天外仙境,都不能再阻隔驾球而来的访问者了。自号“东土西来第一人”的斌椿,曾在游历欧洲之后作诗云:“贯胸羽民三面国,传说已久今在不”^④,盖对于《山海经》以来的种种虚构予以置疑。进而观诸晚清文人的诗作,如:“跳出人寰笑向天,把臂神仙游碧落”(张斯桂《观轻气球诗》),“报道一船来海底,梦中叱起怒流涎”(高燮《新游仙诗》其二),俱表达了科技进步造成空间乌托邦的终结。^⑤世外

① 后来陆士谔作《新野叟曝言》,叙述文初领圣旨,乘坐自制飞舰登陆月球、木星,将中国的黄龙旗插在那里,完成了《月球殖民地小说》的未竟之梦。

② 署名“东海觉我”,与《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续谭》合为一书,上海小说林社 1905 年出版。

③ 《新法螺先生传》似乎是受到 1904 年侠民《〈中国兴亡梦〉自叙》中论调的影响。侠民的文章见于陈平原、夏晓虹 1997,页 142。

④ 斌椿:《泊舟锡兰岛》,《海国胜游草》,收入钟叔和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乘槎笔记·诗二种》,岳麓书社,页 162。

⑤ 张、高的诗作转引自《图像晚清》,页 172,184。关于“空间乌托邦”文学在近代的消失,可参看卡林内斯库 2002,页 71。

并无桃花源,有的都是同样面临着文明冲突挑战的种种族类。

综上所述,晚清科学小说于空间意识的开拓上为传统中国打开了近代视野,气球或是飞车作为小说主要交通工具的意义也主要在此。无论飞不出地球的那种尴尬抑或干脆神游宇宙的那种荒诞,都很恰当地描述了晚清中国的生存危机感。

二 20 世纪补天梦——时间指向的变化

1905年9月19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上海《南方报》第28号附张“小说栏”开始连载《新石头记》,撰者署名“老少年”,至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上海改良小说社印行初版。^①全书四十回,每回一图,封面标题“社会小说”、“绘图新石头记”。作者就是著名小说家,吴趼人。

晚清时候敷衍旧小说的续作新篇者可谓蔚然成风,《新聊斋》、《新水浒》、《新西游》、《新封神榜》、《新镜花缘》等等,且能取悦群俗,十分畅销,《新石头记》也不例外,“甫出版,人争购观”^②。然而吴趼人的续作虽搬用贾宝玉、焙茗、薛蟠作小说角色,却能笔意翻新,使主人公走入晚清中国,“使宝玉与二十世纪相见”[孙楷第1982,页207]。全书头二十一回的故事,不过还是一些在北京、上海等地的见闻,与当时旅行笔调的社会小说无甚区别,盖以古典文学人物入时调作为噱头。然而小说至二十回先由薛蟠书信引出北京长丰店刘学笙(影射“留学生”)办“自由村”,遂教贾宝玉重新上路,无意中进入“文明境界”,在此间遍历种种新奇科技发明,乘飞车猎大鹏于非洲,坐潜艇采珊瑚于南极,甚至目睹“制造聪明”和“永动机”。当经历了所有新奇事物之后,在本书的末回,宝玉得知所谓“文明境”的缔造者乃是本名为“东方文明”的甄宝玉,自从当年别后,经营新世界的开拓至今。贾宝玉见补天之志已为他人所酬,于是留下通灵宝玉,黯然离去。

这么一个收煞,实际上启示了一个重心的转移,即占小说绝大部分篇幅的主人公,他在小说展开种种行动的目的,他所有的一切愿望,他力图去实现的理想——总之,他全部的生命力,在小说最后的只言片语中被另一角色完全掩盖了。甄宝玉虽然只是在三十九回才现身,四十回才透露来历,却是整个《新石头记》后二十回的实际主人公。而这个重心转移也不仅仅限于一书,这也可以代表了中国小说的一个重心转移,王德威说:

① 署“我佛山人撰”。

② 杜阶平:书吴趼人,《小说月报》八卷一号。

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形式,非常依赖历史性的语境来达到其存在的合法性和逼真的效果。这个语境将任何主题——无论是历史事实或玄奇幻想——放在过去的文脉里,以巩固其若有其事的真实感。……可是在晚清时期,这种历史话语失去了力量,因为过去的“过去性”已经不能再为叙述提供存在的理由。[王德威 1998, 页 109]

这种说法足以解释晚清时候的种种古典小说续作盛行的原因:直线进化论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一代读书人,一时还抛却不了的旧故事需要掺入新派的语气、新派的情节才可以吸引读者。而吴趼人的《新石头记》置换了人物的轻重次序,相信读者跟随了贾宝玉经历文明境界的种种新奇事情之后,一定也会纷纷心许于“未来世界”的缔造者,而非那个“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的怡红公子了。

叙述时间的转变反映了新的时间观念,新的时间观念体现了新的一种时间指向,而这也影响了晚清一代“新小说”家们的写作趣旨,不仅要讲述社会内幕,还要抒寄政治理想,更要想象未来之中国,如果可以用《新石头记》半新半旧的主题来说,这就是20世纪初叶的“补天”之志。由于共工与祝融交兵失利,怒触不周山,造成“天维绝、地柱折”,由此女娲炼五色石来补苍天。《红楼梦》中,宝玉前世即那补天所遗留下的石头,长年被弃在青埂峰下。中国文学历有以娲皇补天之馀石作为上古人文遗迹来咏诵比兴的,多有感时伤怀的抒寄。^①吴趼人在小说的结尾所云“补天乏术兮岁不我与”,传达的正是时间的紧迫感。

《新石头记》进入“未来”的叙述结构同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顾》(1888)很像,关于此书,上海广学会1894年就出版了李提摩太节译本,题名《百年一觉》^②。陈平原先生曾经把此书列为开启“新小说”三个重要故事类型和“新小说”家学习外国小说叙事时间的示范文本之一,并且认为,梁启超1902年发表于《新小说》杂志的《新中国未来记》,其整体构思就是受了《百年一觉》的启发[陈平原1997, 页293—294]。梁任公说作此篇已有五年打算,专欲发表一己之政见,因而一直对小说分类很有兴趣的他将之归类为“政治小说”^③。通篇不涉及任何科学幻想,只是把一个理想的政体搬演于未来世界,所有情节就是讲述一个六十年间中国如何完成现代进程的故事。不过正像晚清科学小说家们讲不清楚气球何以能上天登月一样,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也成了仿佛在“历史另一端的神奇时刻”[王德威1998,

① 如元初南宋遗民韩性同《岳王墓》云:“请将衰骨斲苔痕,献作吾皇补天石。”《宋诗纪事》,卷八十。

② 作者名译为“毕拉密”。此前李提摩太的译本曾在1891年12月至1892年4月连载于《万国公报》,题名《回头看纪略》,著译只标“析津来稿”。

③ 参看《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新小说》杂志第一号。

页112] 小说写到第五回便戛然而止。开篇“话表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岁次壬寅,正月初一日。正系我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的准确和自信的口气,随着细节展开而终究荡然无存。

不过,这种立时间标度的准确口气其实也并不准确,因为孔子降生2513年后当为1962年,根据后文所述,自光绪二十八年之六十年后亦当为1962年,与“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差了一百年。小说开篇先交代时间,这也算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一贯采用的方式,中西合璧纪年,开始于清代西洋来华传教士所著的世界历史书,1829年出版的麦都思编撰《东西史记和合》,即将中国古史与西方历史按各自年表分栏并列。梁启超作文很喜欢这种大同思想下的世界意识,^①但没想到换算出了岔子。尽管如此,这种报章体式交代时间的办法倒是确立了下来,对晚清科学小说进入“未来”提供了一个模式。

可以再拿《新纪元》和《电世界》两个长篇来作比较。先说《新纪元》^②,这部小说也是把时间一开篇就定在了“未来”：“西历一千九百九十九年”,作者不能容忍西历纪年的时间坐标“霸权”,于是由此引发故事:中国“明达之士”为统一东西纪元而上书政府,“正值春季大开会之期”,决定“废去年号,改用黄帝纪年”,“就以明年为黄帝四千七百零九年”,仅此也还罢了,无非重复了当年留日学生的“光复”主旨,^③下面的议题则衍生新的矛盾:

请政府饬下地球同种诸国,及附属于中国之各贡献国,一体遵照。

原来这时中国已经久用宪政,国强兵壮,不仅租界收回,领事斥退,而且颇有意思要争夺世界霸主地位了。白种诸国发电聚集于“何来国”万国和平会,决议一起“抵制黄祸”。小说全文就是叙述由此矛盾开始的世界大战,最后,黄种战胜白种,举世承认黄帝纪年(自2000年3月起)。

小说结尾也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诗文:

强弱由来无定许,全凭人力挽天行。等闲莫把天机泄,留待将来再说明。

强弱势力变化无端,却总是不断相互转换,欲窥探其中规律者,总须放于长时段深刻认识之。西洋文化所以在近代世界取得强势,自不可忽视其“船坚炮利”之功,然而这也并非根本所在。西方社会能先于长期科技停滞发展的农业中国确立

① 夏晓虹在《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的导言中开篇即引《三十自述》,其中梁启超把自己的出生时间和中国以及世界重大历史事件联系起来,以为这体现一种自觉置身于国内外风云交汇之际的时代使命感。

② 碧荷馆主人编,上海小说林社,1908年。

③ 晚清日本留学生刊物《江苏》即采用黄帝纪年,另外如《汉帜》采用“开国纪元”,应当类似于“黄帝纪元”。

先进的历法制度,则根据其宗教文化传统建立的时间坐标方能有通行于世的可能,而科学对时间的认识的准确性,也必然多方面影响于其他社会生产生活领域,比如与天文学的互相影响,然后可以推动航海技术的发展,由此又进而刺激探索未知空间的愿望。“西风东渐”,最早对中国知识界生成震动的不在于“奇技淫巧”,而是利马窦带来的先进历法。接受了异族更先进的时间坐标系之后,方能接受新的地理空间观念,接受中国与“四夷”的地域平等关系。晚清时候的科学小说家,纠缠在究竟以基督诞生还是以黄帝或孔子生辰纪元的末节问题上,却看不到时间纪元的根本在于历法制度的先进性,妄议以不知究竟的技术和军事强势就足能力挽天行,实在未能窥破“天机”。那个故作神秘的“将来”,实在教人觉得希望渺茫。

《电世界》^①是晚清科学小说创作中想象与见识都有可算独到之处的一部。这篇小说首回亦标名“廿一纪重登大舞台”,开篇先叙述一则新闻,道的是“亚细亚中央昆仑山脉结集地方,有名乌托邦者”,出一电学大家黄震球,乃刚刚环游地球回国者,欲建立世界之一大“电帝国”,正筹得巨股资金。然后方才交代时间是中国宣统一百零一年,西历 2009 年。只因彼时电学大兴,人寿延长,小说横亘二百余年,结尾已至宣统三百零二年,小说主旨在于描写黄震球如何在此二百年间为人类谋取福祉的经过,如小说第三回所言:

“我电学发明以后,就算世界上人人都做了神仙,有何不可?”

然而《电世界》里描写的“美丽新世界”,总不能如它的缔造者所愿的那样完美,在不断地开发新技术支持的未来生活的过程中,小说家发现了人类阴暗面的挥之不去。比如第三回中对于“世界愈文明,战争愈剧烈,物质愈进化,杀人愈残酷”的认识,较之《新纪元》欢呼拥抱新世界大战的“黄种必胜”的观念要深刻很多。《电世界》的作者更指出技术的进步未必就可以开拓出人类道德的进步来。第七回里面,有人以新式机器造“隋炀帝的御女车”、“汉成帝的掌上戏”等等,教人想起鲁迅先生《电的利弊》里面说的:“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气而已。”^②

小说结尾之处,电王已率领人类移民海底,然而目睹人类之恶行愈演愈烈诸情状,电王黯然萌生出世之意,于是制造“空气电球”,告别地球而独自“进取太白星”去也。

① 高阳氏不才子撰,《小说时报》,1909 年 1 期。

② 《伪自由书》,《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页 14。

《新中国未来记》、《新石头记》、《新纪元》、《电世界》在描述中国未来的时候,无论是把时间选择在哪个年代,都不忘记交代此时之中国乃君主立宪成功之中国也。纵观晚清说部,写立宪题材小说甚夥,论者所经眼者,就有《立宪梦》、《立宪镜》、《恭祝立宪》、《立宪四十年后之中国》、《立宪万岁》诸多名目。吴趼人多次作小说讽刺清廷的“预备立宪”,除了刊载在《月月小说》的《立宪万岁》^①之外,次年他又在《月月小说》发表一篇“理想科学寓言讽刺诙谐小说”,题名《光绪万年》^②,叙述的是自光绪三十二年预备立宪,至今已达光绪一万年,一个“尤肆力于天文学”的中国“伟人”,在自家修建的“观星台”上发现一颗彗星将撞击地球,接下来叙述彗星只是摩擦地球于北极,导致天下万国皆移动位置,中国跑到了从前新西兰的地方。从此寒暑颠倒。“伟人”考得究竟,“不觉从前似醒似梦,若假若真”,下台出户,猛见举国上下也换了模样:

见道路平坦、洁净,大非昔比。行人熙来攘往,皆有自由之乐,非复从前之蹒跚天踏地矣;修洁整齐,非复从前之囚首垢面矣;轩昂冠冕,非复从前之垂头丧气矣;精神焕发,非复从前之如醉如梦矣。

走问亲友,众人大笑道:“子不知宪法已组织完备,今日已实行立宪耶。”

孙宝暄在《忘山庐日记》1903年的闰五月二十八日记述他读《新中国未来记》后的感想,云:

《新中国未来记》者,乌托邦之别名也,不能不作此想,而断无此事也。……演中国之未来,不能不以今日为过渡时代。盖今日时势为未来时势之母也。然是母之断不能生是子,梁任公知之矣,而何能强其生乎?其生则出乎情理之外矣。^③

晚清科学小说中关于未来的想象,其描述总给人感觉缺少厚重充实的生命力,要么乐观得底气不足,要么虚无得东倒西歪,一个观念尚未立住脚,小说家就已经有了新的念头,也难怪后人要提出“幻想是科学的,而不是胡思乱想”的要求。欲寄寓高远之理想,若从现实情形讲起,“景况易涉颓丧,不足以提挈全书也”^④,因此必须起手便叙已经进化之中国,才能化腐朽为神奇。但是究竟如何从旧中国一变而为新中国的,虽然小说家们好像魔术师一样,手法各自不同,却基本超不过保皇派的

① 第五期,光绪三十三年一月,作者署名“趼”。

② 第十三期,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作者署名“我佛山人”。

③ 见孙宝暄1983,页709。夏晓虹谓梁启超之所以不能完成《新中国未来记》,乃因为其美洲旅行改变了他的政治理想,而非如孙宝暄所认为的因为小说所记乃“断无此事”的可能所造成。见《觉世与传世》,页72。

④ 《〈新小说〉第一号之内容》。

君主立宪思想,是故孙宝暄所谓“是母断不能生是子”的批评亦可适用于此。辛亥革命以后,封建王制覆灭,此类政治理想也便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设计未来之中国命运以救赎当下的生存压迫感的文学理想,却不断以新的方式流传了下来。

三 师夷长技以制夷——技术文明的想象

时间指向的变化,尚需一种思想认识上的补充,方能完成得彻底,就是技术文明带来的古今之分别。从另一个方面而言,认识到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人类不断进步,这个思想观念也来自于“古代”与“近代/现代”的分别中。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宋代以后长期停滞不前。晚明出现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所描绘的大多属于宋代以前就已经定型的技术。以至于丁文江在1928年这样感叹:

其他如耕种、灌溉之方,桑蚕、纺织之利,制盐、造舟之法,至今未变。松江之织、芜湖之染,近代几无异于明时,而川江行舟所用之火杖,殆即东坡、放翁所谓之百丈欵。自宋以来,未尝改良,于是知科学未兴以前生活方法进步之不易也。^①

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新奇的西洋科技进入中国时候所引起的震动有多么强烈了。早期的西洋科技是同明清之际的西方耶稣会传教士一同进入中国的。利马窦登陆中国的时候,恰逢明代官方历法《大统历》误差积累导致天象预报数次失效。而此时早已在西方创立格里高利历法,因此利马窦有足够地自信向中国皇帝建议参与改历,并同时向罗马教廷请求派遣精通天文等科学的传教士来华。

利马窦、熊三拔、邓玉函等西洋传教士来华后,进行“科技传教”的方式有二,依照熊月之先生的说法,可以归纳为“实物示范型”与“语言文字介绍型”。前者主要指自鸣钟、望远镜、火器、乐器,后者属于天文、地理、医学、数学的介绍性著作[熊月之1994,页74—75]。在这里主要讨论的乃是西人发明的新奇器物(而非科学思想)同晚清科学小说的关系。众所周知,前现代的中国人对于西洋科技发明有一个认识过程,无论守旧士人“奇技淫巧”的指斥,或者是来自民间的排外的仇视情绪,在20世纪来临之后,随着诸次战争的一再失败而不得不退于一隅。晚清的科幻小说家们受到当时科技书刊杂志的熏染,以及译介而来的外国科幻小说家的影响,也开始模仿着在自己的作品里描摹构思未来世界的新奇发明了。

^①《重印天工开物卷跋》,《天工开物》,岳麓书社2002年,页424。

进入晚清科学小说家视野的比较重要的两种交通工具：气球（或飞车或飞艇）、潜水艇，作为激发当时人们对空间开拓的想象的方式，在小说里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晚清的科学小说作家们偏偏喜欢在小说里嘲笑西方人制作的气球、飞艇的笨拙：

说来也好笑，去年一个朋友到美国去，回来带了一张照片，照的是他们那里的空中飞艇。那照片照的是一片黑影，分不出颜色，倒也罢了。那飞艇的款式更是可笑，艇的上面装上一个胆式的轻气球，卧放在艇上。艇的两旁装了四个翅式的帐篷，看他那样子，全靠气球上升，飞驶也要仗风力。

这段话出自《新石头记》三十五回老少年（即吴趼人的“化身”）之口，与之相对比的是先进了一百年的文明境界的“飞车”：

那飞车本来取像于鸟，并不用车轮。起先是在两旁装成两翼，车内安置机轮，用电力转动，两翼便迎风而起，进退自如。后来因为两翼展开，过于阔大，恐怕碰撞误事，经科学家改良，免去两翼，在车顶上装了一个升降机，车后装了一个进退机，车的四周都装上机翼。纵然两车相撞，也不过相擦而过，绝无碰撞之虞。^①

这类先进的交通工具，已经不同于《月球殖民地小说》里只属于少数科学精英人士的“宝贝”，而成为了中国未来社会寻常日用的交通工具。《电世界》为那时的航空运输网络设想了一套十分周全的计划，并且尽废曾经带有殖民地色彩的铁路与电轨。电学大王黄震球把电力飞艇改造成空中自然电车，车厢如花车，下无轮盘，只备铁脚架，中有电轮。速度达到每小时五六千公里——这是远程，近程交通则使用低飞电车，有供人上下的高塔和升降电机。“要上车的人，只消仰着头把手帕一扬”，就可以随叫随上。由此观之，虽则科学性不够，然而不失为一种合乎人性的美好前景展望。

再说潜水艇。到19世纪末，实用的潜水艇刚刚问世。^②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人才首先把潜水艇大量投入到海战中去。可以说，晚清时候，潜水艇和飞行器一样，都是在科学技术的曙光照拂下举世瞩目的最新奇的发明。当时中国的科普报刊里面也有对潜水艇的简单原理的报道以及对将来投入战争中的优势估计。^③晚清小说家笔下最早坐上潜水艇的人物是《新石头记》里的贾宝玉，想必是受了凡尔纳《海底两万里》^④的影响，小说家也把潜艇描述为鲸鱼形状：

① 《新石头记》二十五回。

② “潜水艇”的译名，大概是来自于日本，1898年《东亚报》所刊载的几篇西国研制潜水艇的报道文章，俱是译自日人桥本海关。1896年《时务报》11月5日所刊《美国创造潜水战船》，也是转译自日本报章。

③ 见1892年冬《格致汇编》第7年第4卷《将来战法》，转引见于《图像晚清》，页184。

④ 1902年有新小说社出版的中译本《海底旅行》。

……叫左右架起透水镜,同看那猎艇形式。只见那猎艇做的,纯然是一个鲸鱼款式。鬣、翅、鳞、甲俱全,两只眼睛内射出光来,却是两盏电灯。

这倒是和“取像于鸟”的飞车相映成趣了。文明境界的潜水艇配有单向透明的透水玻璃、照穿深海的发亮机和透金镜,有行驶机、燃灯机、造氧气机、收碳气机,船体内层还涂了隔离电火的软瓷。粗略看,这些也与西方文明草创阶段的潜水艇设想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奇效就在于仿造的技术偏偏能够胜过泰西的原创。到三十一回里,这艘潜艇碰到了“也沉在水里行驶,然而沉的甚高,并不沉到底下”的西洋“海底战舰”:

宝玉看那船身上有许多螺蛳、蚌蛤之类趴在上面,又生了好些水藻青苔。宝玉道:“怎么我们船上没有这个?”老少年道:“我们的软玻璃是用药水质制过的,不惹这些东西。你看他的船虽然沉下,还有烟筒、气管露出水面呢。”

随后西洋潜艇想要与之竞速的时候,老少年又说:

“那种船一个时辰走不到我们一半的路,也要赶来,真是可怜可笑。”

对于潜水艇制造近三百年的探索,长期以来困扰设计者的最大问题,一个就是动力的问题(电动机出现后,一时还不能解决海底充电的问题),一个就是人的水下呼吸的空气供给问题,由小说的描述我们可以推知贾宝玉们遇到的西洋潜艇乃是蒸汽制动并需要长长的一端浮在海面的气管来获得新鲜空气的,这想必是得自当时的科普读物里的介绍。^①其实凡尔纳的笔下早已尽量周全和科学地构想过海底旅行的技术蓝图了,吴趼人在他的小说里,所能想到的也并未超出这个范围。

然而晚清科学小说也曾经屡屡想突破西方科学幻想所勒定的那个前景范围,采用的办法就是重新拾起已经被近代科学否定的那些设想。《新石头记》三十五回里面,东方文明之子东方法向贾宝玉交代飞车与潜艇的动力来源的时候,竟然祭起了永动机这样法宝:

那种机器,只第一次用时,要烧一回火,蒸出气来,运动了机器,生出了电火。从此就借电火蒸气蒸出气来,仍是运动机器,机器仍能发出电火。所以就能周而复始,生生不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

永动机之说自印度数学家婆什迦拉(Bhaskara, 1114—约1185年)提出设想,随后由穆斯林世界传入西方文明,在之后的五百年里人们提出了众多的设计方案,然而从没有真正成功过[李约瑟1976,页375—377]。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的提出

^① 1892年冬《格致汇编》第7年第4卷《将来战法》:“以长皮管通空气,使人呼吸。”所谓烟筒云云,因为当时的西洋潜艇是水下用蓄电池制动,浮在水面时候用蒸汽机或柴油机制动,小说家以讹传讹,竟变成如此粗陋。

分别驳斥了第一、第二永动机的神话,这是19世纪中叶的事情。然而需要指出,此后依然不断有人继续在挑战被近代科学所否定了的永恒动力之路的开拓。至于晚清人士对永动机的向往,只能归因于他们从表面认识西方科学的不完善,而并非真能突破近代科学的视野和范围。尽管如此,我们也还是应该肯定晚清小说家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动力远景^①带入中国文学表达中的价值。

比较文明境界的“永动机”法宝合乎科学之标准的,应该是《电世界》里电王黄震球所推动的材料与能源革命了。小说第二回“新原质大辟工场”,电王在新电学展览会上宣布自外星陨石中提炼一新元素“铨”,吸铁能力强于一般磁精的五千倍,韧性、展拓性也无可比拟,能聚集天然电气,自成一小型电机,“众人觉得眼电光也几乎被吸去”。第六回,“钿灯一明春生南极”,黄电王把居里夫人发现的新元素钼(镭)也用来作为光源。当年鲁迅先生第一次向国人介绍这一科学界新成果的时候,曾说“盖钼能本体发光,及与光于接近物体之二性质,宛如太阳与光于周围游星然。其能力之根源,竟不可测”。^②有此两种新物质,上天入海、再造新世界的千古幻梦才算是有了一些实现的依据。

晚清科学小说此外还想象过许多十分美好的技术蓝图,比如《女娲石》^③里,秦爱浓发明的食物加工提纯营养的机器,能在饮食上面保障人寿的延长,还有驾驭随意、奔走迅疾的“电马”。比如《新石头记》里,文明境界重新采用了“地火”^④,优于西人烧煤,贾宝玉用助聪筒在五万人讲堂里听课,用助明镜和透水镜观海底水师演武,发明无线电话进行水师通信,还有马力强大的隧车,开发极其阔大的地下隧道;还有水上行走的水靴。比如《新野叟曝言》里,文初发明的外星飞舰,可以有助于人类殖民木星、金星,太空仓里有发光药水和空气更新装置。又比如《电世界》里,因为怕人脚在代步利器发达后终于不会走路而退化成药,便使用平路电机贯通全球街衢;以钼灯造温室,令大沙漠尽在21世纪消失;发明电犁,一人操作可以耕作五六千亩田地;对废品回收处理成电气肥料,又可使农作物得以进化;凡遇山冈皆种树木,石质不便以电热化之;各家各户的电针上装有杀菌良药,政府专设机构以十万倍显微镜于各处查看;还有观象台、留象镜,世界各地大小事件同步察看;人可随身携带传音筒,能随时彼此异地通话……

此类叙述可视之为“技术梦想”,西方技术史家说:“传统习惯将技术专家描绘

① 虽然目前已经不被看好,但是超导技术和真空条件下仍可能使之有意义。

② 《集外集·说钼》。

③ 16回未完,海天独啸子著,卧虎浪士批,东亚编辑局铅印本,甲卷1904年,乙卷1905年。

④ 古代蜀人曾用天然气为能源。1843年,煤气路灯出现在上海的街头,即被称作“地火灯”。

成一个受功利的眼光支配、有理性、讲实用、不动情的人,技术梦想却向这种认识发出了挑战。”[巴萨拉 2000, 页 73] 人类文明的进步,一定程度上所依赖的正是那些梦想。我们自然也不必把晚清小说家们的科学技术预言估计得太高,因为很多内容显然得自于当时西方科学思想的启发,并且他们在理解和借用中存在着或有意或无意的误会。然而考虑到这乃是中西思想文化真正广泛交流、碰撞初期的产物,我们就不得不认真看待这些幼稚的“世纪新梦”,他们启发着现代中国前夜的那些沉睡的灵魂。

四 忧天忧人大慈悲——战争与灾难预言

晚清科学小说家们在预言科学技术的美好前景的同时,也常常把存在于人类生活阴影中的两个话题描摹于笔端,一为战争,一为自然灾害。

描述未来世界之战争的科学小说,多是受晚清兴起的所谓军事小说的影响。1912 年管达如《论小说》这篇长文,其中曾谈到军事小说的作用,亦可延伸来说明晚清科学小说战争题材的义旨:

近来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非提倡军国民主义,不足自存。若得深通军学之士,多著此等小说,于社会必大有裨益也。^①

晚清时代中国社会的最大忧患在于种族存亡,当时的科学小说因此不能避免要设立这一场“保种”民族战争的大演习。《电世界》里,电学大王的人间仙境尚未动工,先有欧洲中原之西威国在 1999 年发起飞行舰队,欲以此尽灭黄种,其中使用炸裂弹,杀伤力很强。黄震球发出“世界愈文明,战争愈剧烈,物质愈进化,杀人愈残酷”的感叹,于是操“鏖枪”,乘“电翅”,如同超人般一人击落上千艘西洋飞舰,谋得世界和平。

需要指出,科技军事入中国小说的战场,并非晚清科学小说家所独造。此前早有俞万春写于 1853 年的《荡寇志》,借《水浒》的小说底色,招来西洋科技,合以中国古代神通,最终把梁山好汉全部消灭。其中“奔雷车”、“沉螺船”可看作是坦克车和潜水艇的前身。^②

想是受了如包天笑《空中战争未来记》^③一类军事小说的影响,晚清科学小

^①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页 402。

^② 王德威在《重读〈荡寇志〉》中对于俞万春小说所处时代的诸种话语形式的新旧夹杂有深入分析,见陈平原等主编 2002,页 431—437。

^③ 1908 年《月月小说》第 21 号,作者题名“笑”,小说分类标“科学小说”。

说家们似乎也闻到了西方列强军备竞赛背后浓烈的火药味。他们在欢呼中国未来的科技胜利的同时,也毫不犹豫地将在征服白种文明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加以赞颂。突出的例子就是《新野叟曝言》和《新纪元》。其中《新野叟曝言》里的主人公真正功业在于殖民外太空,征服欧洲“七十二国”只算是略施手段:带领五艘军舰,依仗“淡养甘油”就令全欧诸国俯首称臣。《新纪元》没有令中国的科技优势达到那么领先的地步,而是采用类似《封神榜》之流的“斗法”故事模式,以“行轮保险机”、“海战知觉器”、“洋面探险器”破鱼雷突袭,又从海下奇国“婆罗洲”处借来二十具“洞九渊镜”可观察“潜水雷”;比利时博士为白军造“水上步行器”,于是黄军参谋就仿西人捕捉禽兽之法,用铜丝造电网,名“如意艮止圈”,以此破水上步行军;当白军使用“绿气大炮”一类化学武器的时候,主帅闻说一个山西化学教习通晓对策,于是回乡去请高人,得到的办法就是神秘的“化水为火之法”……后面还有什么“避电衣”、“速射炮”,推动战事愈发惨烈,先有中国气球队空袭成功,又有白军放出炭气毒杀气球队员。最后取得克敌制胜关键的,是主帅夫人金景嫒,用“消电药水”和“吸炭气电机”破敌人杀人利器,使出“百年前独国人所传”的号称“五金质内之坚光”的“追魂砂”,终于逼迫白种低头认输。

晚清科学小说家们,一方面看到了依仗科学技术发展国防军事的现代化方向,另一方面却又极力渲染高科技武器的杀人威力。似乎前者的宏大理想可以遮蔽后者的不道德和非人性,能对此进行反省的声音比较微弱。除《新世界》“世界愈文明,战争愈剧烈,物质愈进化,杀人愈残酷”的感叹外,还可见于《女蜗石》十六回,叙述翠黛由亡国忧患生出四个问题:为何世人不要太平要战争?为何自己有国还要夺人之国?文明为何就是能杀人夺国?公平为何无人主之?更常常为今日学者所称赏的是《新石头记》三十八回里的发明,东方德造出“仁术”(其实就是飞到敌营上空洒蒙汗药水),可以避免伤亡而取得胜利。陆军都督西门觔解释说:“虽然两国失和便是仇敌,然而总是人类对人类。若只管贪功取胜恣意杀戮,在临时时自然忘了同类相残的忍心暴动。试问一作局外人想,眼见得因一时之气伤残同类,岂不是不仁之甚了么?”

思想深沉的小说家或许会在工业文明的全盛时期依旧抱定“仁义”治世的儒家理想,尽管看起来没有实现的可能。在虚浮的“科学万能”幻想中,更容易唤醒的是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嗜血”欲望:

强大起来的中国,不只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而且将欧洲作为自己的殖民

地。这虽然只是个别小说家的幻想,却蕴涵着一个极为严肃的话题,即被压迫者如何看待“压迫”,或者说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应该怎样看待“殖民”。“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只着眼于具体的个人、民族、国家生存处境的改变,而不追究是非与曲直,虽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起码在晚清是如此),却并非小说家所标榜的“高尚之理想”。……对于未来世界的想象,很大程度受制于现实处境,对现实的不满,可以催生出各种各样的“理想”,但并非所有的理想都“高尚”。[陈平原 1996]

从这个角度来看,晚清科学小说家对战争的理解深深受到西方殖民主义思想的影响,杀人夺国成了实现国富民强的手段。《新纪元》结尾,交代英、俄两国不肯在和约上签字投降,作者看来是还打算日后作一书叫各国二次大战。然而杀人武器的斗法必然造成两败俱伤,这一结果未必不在晚清小说家意料之内。可是为了“高尚之理想”,所有这些便可隐而不表。这样一种矛盾心理,通过对“世界末日”的预言透露了出来。

近代中国在西学东渐中认识到了一个新的、变动不居的时空世界,在一个开放的长时段里,人类生活的地球也会面临着难以预测的命运,曾经的“杞人忧天”,已经不再那么可笑。晚清出现的科学小说,为居此生活处境里的中国人提供了抒寄这一类感受的文体形式。

在最早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中的龙氏一家殖民月球,无非是因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而《新野叟曝言》与《电世界》的殖民海底或殖民外太空,则是迫于未来世界的人口压力导致的土地、能源等等资源危机所致。然而更为可怕的是那种不可预料的天灾,晚清社会时常荡漾着虚无主义的精神气氛,这很容易形成一种色调灰暗的灾难预言气质。

如果把纯粹游戏笔墨的“光绪万年”排除在外,关于此类题材,可以包天笑写的《世界末日记》为代表。^①小说开篇就叙“经一亿万年而后,忽闻有太阳及各行星将灭绝之一说”,引起人类大恐慌。纷纷“走此广漠之天空,以谋更造新世界也”。故有欧美学者“奔走喘汗乃成一新世界建设同盟会”,此时已经来不及计较什么种族、贫富之别了,人人心中仅有逃出太阳系,别造天地之急。于是汇集群贤商讨对策,各种文化思潮代表依次亮相,科学家、教徒、释家、灵魂学家、理想名家、狂人等等,或悲观或乐观……此时警钟大作,天文台报道月球正向地球飞来,一切努力,顷刻化作泡影。接下来小说描述,月球向地球逼近后造成的飓风与海啸,地球生民

^① 1908年《月月小说》第19号,作者题名“笑”,小说分类标明“科学小说”。

顿失殆半,太阳光热也急速消减,花木枯萎,四处阴风。最后月球触地前夕,尚还仅存几人,其中有一天文家说:

“宇宙万物虽微尘纤芥,无一秒中不含其进化之点者。今吾人所处之世界,虽云灭亡,然不过进化之一现象,蜕旧易新而已。矧以物体不灭则言之,即吾人内体亦不灭,遑论精神。渺渺天空,宁无寄我精灵之地?一念及此,又何用增其悲怀耶?”

于是众人心皆安定,安祥而终。月地相合,“自此以后,纪者亦无从下管”。

大凡一个时代的断裂期或者说变动时期,道德失范,社会动荡,人们日常生活受到无形的威胁,这样就比较容易产生一种末世的(fin-de-siècle)情怀。末世云者,未必就是书写世界末日,比如晚明士人内心生活里的戾气,就是这样一类精神现象的写照。然而晚明士大夫所感怀的,可能更多还是异族入侵导致朝代更替的“衰世”。包天笑这篇创作则包涵了传统中国文学经验不同的内容,应该受了西方题材小说的影响,1902年发表在《新小说》杂志创刊号上的“哲理小说”,即同样名为《世界末日记》^①。在这篇译作里,时间至于西历220万年,由于“地球日以老,太阳日以冷”,人类文明最后的中心移到赤道附近、非洲中央,从前名都巨府今已都于数十万年前埋在冰下。末日前的生活极度恣肆狂欢,男女平均人寿25岁,举世避孕,唯有下层妇人还记得尽为母之道,随后又是几次迁移,最终只留下一少年一少女一犬存活在世界上。这样的故事倒是和《圣经》里的洪水与诺亚方舟相近,不过对于奢华颓败的纵欲精神的铺陈,应该是由包含着颓废意味的一种现代意识所激发而成的。

卡林内斯库说,“时间的破坏性和没落的宿命属于所有神话—宗教传统都拥有的重要主题”[卡林内斯库2002,页161],而现代意义的“颓废”则表达了人类自愿加速了这种时间的破坏性。19世纪后期的现代世界曾经洋溢着各种世界末日的预言,与工业社会的机械理性形成鲜明对比。译作《世界末日记》表达的,正是机器文明推动人生活体验的瞬间化、而人又回过头来继续追求更为瞬间化的快感的过程中逐渐逼近的那种“末日”感受。

《列子》中的杞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后世多以之讥嘲执于不可忧虑之忧虑的多情者。然而杞人忧天里面包含着对自然宇宙原始观察中的直观猜想,本可

^① 篇末译者言“此法国著名文学兼天文学者佛林马利安君所著”,译者署名“饮冰”。按,这篇是从日本德富芦花的日文译本转译而来的,弗拉马里翁(Camille Flammarion)的原作《世界的终结》(La Fin du Monde, 1894)本来是一部长篇小说。弗拉马里翁是法国著名天文学家,以此小说来阐明他对19世纪流行的“热寂说”的反思。

珍贵,“忧彼之忧者”根据常识将忧虑消解,却不可了解此一猜想中的长时段的时间意识,故长庐子“闻而笑之”,列子又于后“闻而笑之”,曰“何容于心”,这就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看重生命价值,轻视外物之有待的精神使然。就在《世界末日记》的译后语中,梁启超以为这篇小说乃是“以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与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组织以成此文”,这其中的道理好比释迦牟尼为大菩萨所讲《华严经》的教理一样高深,难为凡夫所了解。随后他说:

一切皆死,而卿等贪著爱恋嗔怒猜忌争夺胡为者?独有不死者存,而卿等畏惧恐怖胡为者?

这话说的和包天笑小说里的天文学家的口气如出一人。“独有不死者存”,所谓“不死者”,想必就是物质和“吾人内体”的原素了。这么一种机械的唯物论,生发的观点却是在论证着一切纷争一切有情都无意义的精神价值虚无观,暗合了晚清的学术思想风气:虽言其虚无,却有积极意义,乃是要救治“物质文明烂熟”之日世间“精神上之饥饿”[梁启超 1998,页 196]。这与上文以嗜血心理描写战争题材的一类科学小说呈现出的是完全相反的精神世界,然而却都十分真实的折射出晚清社会所荡漾的思想情感。

五 经国伟业畴人传——科学家形象的塑造

1818年,玛丽·雪莱(Mary W. Shelley, 1797—1851)写成《弗兰肯斯坦》,小说里有一个神秘、疯狂的科学家,躲在摆满化学试验器皿和各种仪器的密室,从事着外人不可得知的古怪发明。《弗兰肯斯坦》的副标题是“现代普罗米修斯”(The Modern Prometheus),这表明科学家自觉要成为现代文明的造福者,注定是孤独而坚强的,他的理想远大,而决不能被现实权威所接受。而这个普罗米修斯不仅带来了照亮人类未来的文明火种,也带来了潘多拉的盒子中的种种罪恶。小说探讨的是,科学家的高尚理想是否一定可以带给人类福祉,这一问题被后世的科学幻想文学所反复探索。

西方科学家的形象由来已久,其前身是炼金术士、星占家以及发明种种神秘疗法的古医师,俱为神学时代里自然的观察家和理性的思想家,往往如浮士德博士终身独处于暗室中。宗教审判所的火与剑注定了科学之途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尽管先驱者的认识方法多有错误,但是他们为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大学建立后,知识界逐渐摆脱了教会威权,使得近代意义的科学家开始出现,牛顿

是最后的炼金术士^①,也是最早的科学家。

这样的谱系,对于早期西方科幻小说家设计笔下的人物形象显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②凡尔纳、威尔斯笔下的英雄,往往会远离培根《新大西岛》的科学院这类象征着现代权力的机构部门。^③不论《征服者罗比尔》、《海底两万里》还是《摩若博士岛》、《看不见的人》,那些力图改变人类命运的人都是孑然一身、孤傲不驯的。

当晚清中国人做起科幻小说来的时候,如上文所说的这样一个精神家族,隐藏在由飞车潜艇引发的惊奇背后,很难得到正确的认识,这也是与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家所代表的另外一种命运有关系的。李约瑟曾引过19世纪奥地利学者弗兰茨·屈纳特的一段话:

许多欧洲人把中国人看作是野蛮人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在于中国人竟敢把他们的天文学家——这在我们有高度教养的西方人眼中是种最没有用的小人——放在部长和国务卿一级的职务上。这该是多么可怕的野蛮人啊!^④

这段话虽然有些夸张,^⑤却十分正确地说明了中国的天文学家和皇朝政权的密切关系。天学在中国长期属于官学,这符合封建农业大国君主专制政体的需要。没有科学家与宗教权力机构的对立,却存在着科学家与意识形态的合流,无论太史局、司天监、钦天监还是灵台,所有的科学活动背后的意义都在于“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至于通晓炼丹术、物理机械技术的道墨之流往往地位不高,但也得到各种方式的保存和延续。^⑥根据李约瑟的研究,中国古代技师之最

① 丹皮尔曾在《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珣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提及牛顿在大学里继续从事炼金术研究的事情,见该书第四章“牛顿时代”。

② 在玛丽·雪莱的小说中,弗兰肯斯坦少年时期曾长久地着迷于中古的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而不满现代气息的实证科学。

③ 培根的《新大西岛》描述的理想国里,国家机构的核心是“所罗门宫”(Solomon's House),“这个机构的目的是探讨事物的本原和它们运行的秘密,并扩大人类的知识领域,以使一切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何新译:《新大西岛》,商务印书馆,1959年,页28。)这种设想,代表了后来欧洲诸国成立皇家学会或国家级的科学院一类机构的先声。

④ F. Kuhnert, *Das Kalenderwesen bei d. Chinesen*, *Oesterreichische Monatschrift f.d. Orient*, Vol. 14 (1888), p. 111. 李约瑟 1975 页 2。

⑤ 江晓原在《天学外史》第四章里曾经对历代天学职官以及天学机构进行梳理,他认为李约瑟所引的这段话是强调古代中国社会的天文学家地位之高,但实际上皇家天学机构一直在礼部管辖之下的,所以官阶并不至于那么高,而天学家有时受到宠信,有帝王师的待遇,作用又比“国务卿”大得多。见该书页 50—51。

⑥ 几乎所有朝代都有完备的宫廷工场(有“尚方”之官职,如隋唐时期的少府监)和兵工厂(如隋唐时期的军器监),时而有国家承包的带有技术含量的机构(比如秦代的治粟内史,汉代的盐铁部门,唐宋的将作监、都水监等)。中国古代的工匠与工程师往往从属于这些国家机关。参看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八册“机械工程(上)”,《封建官僚社会中之工匠与工程师》一节,页 19—66。戴吾三:《中国古代的科技官职》,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科学中国人》,2001 年第 1 期。

多数者,是低级的技术官吏:

此类人士皆受有充分良好教育(即使出身低微)而进入官僚阶级,但其特殊才能或品格阻碍其能有灿烂前程之一切希望。彼等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后之世界中,于科学或工程方面为应可成名之一类人士。^①

因此历代正史虽列《艺术传》、《术艺传》、《方伎传》之类保存当朝之科学家的活动资料,但常掺杂占卜阴阳之术,纪录之目的唯在于“博闻”^②、“广见闻”^③而已。清代学术在总结与复兴古学的时候,受西学冲击与影响,有意识打破旧的知识结构,开始重视清理周秦以降的科技遗产。成书于嘉庆年间的中国第一部科学家传记专著《畴人传》,由阮元延揽幕宾李锐、钱大昕、焦循等汉学名家合力完成,为这一时代风尚的反映。此后经过罗士琳、褚可宝、黄钟骏的几次续补,“中国古代科学家的事迹基本囊括其中”。[韩文宁 2000]

晚清科学小说时常涉及科学进步对社会、人生的改造,这些变化势必促使新式的人物形象在小说中出场,^④然而历史传统也不可忽视地影响着晚清科学小说对“科学家”形象的理解与塑造。大致可以把这一形象分为三类:

第一类,政权主脑人物。

20 世纪之前的中国,西方文明所传入的诸种声光化电科技知识尚且统称为“格致”之学,自康有为、严复等人以后,逐渐改用“科学”取代“格致”之名。^⑤这一名称的更替,表明了中国明清学者的实学传统至此让位于西方文明的知识系统,国人要用儒家“格物致知”的新义去突破西学之笼罩的自信心遭到严重打击。新式学堂的兴起、科举考试重心向新学的偏移,都使得新学之士为世人所瞩目。尤其是 1905 年科举废除之后,清廷每年举行归国留学生的考试,根据成绩授予进士、举人等出身,然后再给以官职,纳入其官僚系统中去。时人有竹枝词,云“各国归来留学生,一经朝考上蓬瀛”^⑥,即记此事。

强调小说有移风变俗、益国利民之功能的清末文学家们,他们设计出的政治理想包涵了由具备科学头脑的知识精英分子来管理国家的愿望。有清一代,通过权职

① 《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八),页 60。

② 《晋书》卷九十五。

③ 《魏书》卷九十一。

④ 如《孽海花》中提到李善兰(更名李任叔),但不涉及其科学活动;又如科普文学中以某某科学家现身说法,原本是为讲解科学原理,这两种情形均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⑤ 康有为、严复所使用的“科学”一词,是借鉴日本兰学家们的用法。日本学界 1880 年把“科学”一词意义固定为“分科之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知识体系。参看汪晖 1997,页 221—225;冯天瑜 2004,页 373—378。

⑥ 兰陵忧思生:《京华百二竹枝词》,宣统元年,《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年,页 124。

之便,推行实学实业,促进中国科学精神之复兴的“理学名臣”、封疆大吏,可谓大有人在,如李光地、毕沅、阮元、陶澍、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科学小说家们或许就是在这些形象上突出其人的科学才能,以寄托各自的经国理想。

《新野叟曝言》(陆士谔撰,上海改良小说社,1909年)里自称学问全自《大学》“格物致知”章句出的文初,这一形象即代表尚且抱持振兴理学之望的守旧人士的心理。故驱使主人公以周易学理造得醒狮飞舰、“淡养甘油”,令欧洲“七十二国”俯首称臣,先后历任“征欧大元帅”、“欧洲总监大臣”、“木星都督”等职。针对晚清西学之风潮,他如此议论:

即学得与他们一样,也未必见得定可以胜人。……因人家是会创造,我只会得学习,我学了这样,人家又会造出那样来,所以说学他人法子,学一世也不会胜人,就是这个缘故。

这可说是比前文所述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要警醒许多了。比他“新派”一点的是《新纪元》的主人公“总统水陆兵马大元帅”黄之盛,小说家言,黄元帅生在山西解州,“乃是上古黄帝战胜蛮族、禽杀蚩尤的所在”,出过关羽、张守珪、司马光等“伟人”,黄父是本州学堂的化学教习。黄之盛曾在天文、农务、水师、陆师、万国语言等学堂就学,中间有十五岁到十七岁辍学回家守孝一节,可谓忠孝两全、东西合璧的结晶。

还有《电世界》里的电学大王黄震球。由于侧重点在于建设,小说家便树立一个无时无刻不在忧国忧民的“科学宰相”的形象。黄震球对于新元素的发现,新材料、新能源的利用,还有诸多十分有见地的技术开发的决策,都使得《电世界》比前论的两部小说,塑造出更合乎现代意义的科学家。而黄震球也比文初、黄之盛更多体察到类似西方科幻小说中的科学家的那种孤独和痛苦,他屡次发现世人使用他的发明继续行恶,以至于最后告别地球,独自乘气球飞往金星,这似乎也是在宣告着未经科学启蒙的民族实行科学精英政治之理想的失败。

第二类 科学辅政人员。

晚清科学小说自然不能满足于此职能,而是着力创造一个不断开发“领先世界潮流”新技术的科学群体。他们表现为两种身份,一是学堂教习,一是高官幕僚。前面提到清代幕僚“佐治”制度十分兴盛,尤其道咸以后,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军起义的蔓延,使得各地封疆大吏纷纷网罗通晓西学、实学的人物。“谈天近方厌,投笔起从戎”^①,作为近代著名的科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等都做过曾国

^① 张文虎:《怀人十五首》“李善兰 时从军”,《舒艺室诗存》(五)。

藩的幕友。李善兰所译《几何原本》^①即在此期间得以刊布于世。中国人第一次研制成功的蒸汽机轮船“黄鹄号”,也正是这时,由华蘅芳、徐寿父子合力完成的。

这个风气也影响到晚清的科学小说的人物设定。比如《新纪元》的“黄白大战”里,黄之盛属下的参谋们各自携带自己的发明轮番献宝,增加了“斗法”故事的可读性。^②

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也诞生了晚清时候中国的一批“科学机构”,如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这样包含诸如教育、翻译、制造等性质的一类单位。这些单位不怎么具有科技创新能力,而是非常强调“实业”以及科学技术的宣传工作。太平军运动失败后,曾经在曾国藩幕府佐治的李善兰等人都进入这类机构担任教习,这意味着长期处于边缘状态的科学家将进入学术领域的中心地带,这在当时思想进步之士看来,是感到万分振奋的。^③

《新石头记》后二十回所描写的“文明境界”,即布满各种学堂、博物院,书中的新奇发明都是出于这些机构的教习、博士之手,包括缔造者东方文明的几个子婿,也是以此类身份存在于其中。小说三十八回说到东方法、多芝士、华自立三位博士合作,用纯净玻璃制造出一尊神奇电炮后,就联名写信给陆军都督,述明发明的特点、性能,然后经过当众试验的考核才能由长官决定是否得以投入使用。可见当时人们理解的学堂教习是和幕僚性质相同,都要服务于上级官员。

第三类,另有胸襟的民间科学家。

晚清科学小说里也出现了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科学家形象,不过他们并非现代意义上所谓的知识分子,而是别有政治抱负、不能见容于现政权的“革命党”。

《月球殖民地小说》里的玉太郎夫妇,作为晚清的东瀛义士和中国新女性代表,他们与所同情的龙孟华有着相同的政治理想。随着气球升空视野扩大,众人看到人类的渺小,“反清复明”口号终成空谈,人物形象如同他们的气球一样飘无定所,找不到归宿和寄托了。

《女娲石》的主人公金瑶瑟是位留过学的女革命家。近代中国的知识界,尝把断

①《几何原本》,古希腊欧几里德著。明季徐光启、利玛窦合译过前六卷,李善兰续译后九卷,由曾国藩资助刊行。

②产生于太平天国时期并被当作宣传品的《荡寇志》里面,善造科技军器的洋军师白尔瓦罕,是所谓匪寇的梁山泊一方招聘的,而在1899年成书的《年大将军平西传》(《平金川全传》,张小山著)中,参与年羹尧平西藏的子南国泰克绍箕裘,就是支持清军的西方科学家。到了20世纪之后的科学小说中,西方科学家不再为中国人效力。

③张文虎尝作“送王叔以算学征入同文馆”八首,有“人言此去非轻出,数学昌明万古空”(其五)句,又云,“习算同文馆特开,搜罗贤俊上金台。通商别具平戎策,要试强兵富国才”(其六,附注:“君论算学一明即可强兵富国”),《舒艺室诗存》(六)。

头台前从容就义的法国女革命家罗兰夫人,捧作“近代第一女杰”,其反抗暴政解救祖国的形象,“在当时妇女独立意识开始萌发的语境中,对女界更具有号召力”^①。清末的革命党人,亦把女学同政治革命联系在一起,“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是故蔡元培、蒋观云等创办爱国女校,“预备下暗杀的种子”^②。金瑶瑟几番行刺太后不成,避祸出逃,才引出女科学家秦爱浓、汤翠仙登场。开篇所渲染的女子暗杀党风潮,以及如同“女黑旋风”的丫鬟凤葵颠覆性别叙事规范的种种壮举,可构成一特别的语境,在此间女科学家们讲出她们种种改造社会的理想,比如人工生殖(第七回)、全民洗脑(第十回)等等,正是从近代女界最敏感的身体话题生发出来的。

可以说,晚清科学小说家虚构了一个新兴的中国知识群体,^③他们的身份包括了主政者、辅政者以及革命分子。这其中所投射出时代的影子,即如梁启超所说,对于新学的态度实际上是另有怀抱的,遂“不知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梁启超 1998,页 98]。小说家们显然对于凡尔纳、威尔士笔下只专注于科学发明和知识探求达到怪异不近情理地步的科学家形象毫无兴趣,人间功业与自然界的探索必须齐头并进。即使像神话人物一样的“新法螺先生”,在他的上天入地的经历中,也总不能忘记“别构成一真文明世界,以之愧欧美人,而使黄种执其牛耳”的抱负——当我们读到许地山写于 1940 年的《铁鱼的鳃》,那个报国无门愤然沉海的潜艇专家雷先生,会发现他和晚清小说中的科学家实质上是多么的相似。

结 语

到此为止,本文力图展现的,是某一特定的时期(1904—1911),一种具体的小说类型(科学幻想小说)所带有的时代特征、思想面貌。明清以来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包括自发的和被迫的两种,都促使中国的知识界打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习见,因而颠覆同邹衍之“大九州”的世界图景相联系的文明中心意识。乾嘉学者对于西人所言之世界地理尚存有的怀疑,^④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已经彻底消除

①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页 203。

②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宇宙风》(55)。

③ 此一虚构的知识群体或许可以库恩所谓“科学共同体”(指从事科学活动的主体集团,所受教育和训练有若干共同因素,并且集结在权威科学家周围,有固定的交流手段和术语、标准,参看段治文:《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页 81—83)名之。目前学界所公认的中国第一个真正的科学共同体是成立于 1914 年的中国科学社。

④ 尤侗撰《明史·外国传》,以为利马窦所言“天下有五大洲”为“荒渺莫考”(《明史》,列传二百十四“外国七”,“意大里亚”),《四库总目提要》亦将《职方外纪》所论视为“不可究诘”。甚至就是对于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中国士人同样大多茫然无知,“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黄遵宪:《日本

了。凭借上天入海的交通工具向未知空间的开拓,以及凭借新能源和信息技术来延伸对于空间的掌握能力,这两者在晚清的知识界看来是一种高尚的理想或说崇高的精神,他们试图将中国引向一个新世界。

经此千年未有的巨变,传统之文化经验、文学表述都不可一下子作出积极应对。所以晚清社会体现出多音复义的矛盾状态:一边是觉醒的民族意识,一边是《礼运·大同篇》的普世理想;一边是对未来中国的无限憧憬,一边是一切皆空的末世情怀;一边是对西方科学技术的依样画葫芦,一边又是掺杂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立刻就技胜一筹的十足信心。近来学者们对于晚清科学小说中时代主题的研究,可包涵如科学兴国、批判迷信、女权、教育、国族政治之类的论题,^①或许当作为一种“现代化”进程的铁证,来说明晚清持续到五四以后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然而如此却不能解释晚清此类型小说创作的独特风貌,一种夹在中与西、古与今、科与幻之间的迂回、尴尬。

参考文献:

晚清报刊杂志

《格致汇编》

《小说时报》

《小说月报》

《新小说》

《绣像小说》

《月月小说》

作品集

碧荷馆主人 1908.《新纪元》.上海:小说林社.

董文成、李勤学 1997.《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丛书》.(第三、四册).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陆士谔 1909.《新野叟曝言》.上海:小说进步社.

我佛山人 1987.《新石头记》.广州:花城出版社.

于润琦 1997.《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研究著作

阿英 1996.《晚清小说史》.上海:东方出版社

国志自叙》,《日本国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0辑,文海出版社,1981年)。

① 林健群:《未来的现实倒影——晚清科幻小说的时代论题探研》,台湾交通大学2003年科幻研究学术会议(csfs2003)论文。该文总结了五个晚清科幻小说的时代论题:“科学救国的呼吁”,“民族意识的觉醒”,“政治改革的寄托”,“女权思想的促发”,“迷信陋俗的批判”。

- 巴萨拉 2000.《技术发展简史》.周光发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陈平原 1997.《陈平原小说史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 陈平原、夏晓虹 1997.《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陈平原、夏晓虹 2001.《图像晚清》.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 陈平原 1996.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中国文化》.(13).
- 陈平原等主编 2002.《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 陈思和 1997.《陈思和自选集》.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
- 冯天瑜 2004.《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北京:中华书局.
- 韩文宁 2000.我国科学家传记的开山之作——阮元与《畴人传》.《图书与情报》.(1).
- 李约瑟 1975.《中国科学技术史》.(四).北京:科学出版社.
- 李约瑟 1976.《中国之科学与文明》.(机械工程学·下).钱昌祚等译.台湾:商务印书馆.
- 梁启超 1998.《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卡林内斯库 2002.《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孙宝暄 1983.《忘山庐日记》.(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孙楷第 1982.《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王德威 1998.贾宝玉坐潜水艇——晚清科幻小说新论.见王德威等.《想像中国的方法》.北京:三联书店.
- 汪晖 1997.科学的观念与中国的现代认同.见《汪晖自选集》.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武田雅哉 1981.清末科学小说概述.《科学文艺》.(4).
- 熊月之 1994.《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朱维铮主编 2001.《利马窦中文著译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樽本照雄 2002.《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济南:齐鲁书社.